

全球化语境下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新思潮

尹晓煌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涌现的人文与社科领域新思潮, 解读当今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的各种主要论点及重要流派, 如“新保守主义”“新左派”“跨国民族主义”“灵活资本主义”“流动公民”“记忆的政治”“亚洲价值”“可持续发展”及“软实力”等; 通过对这些理念的产生及其影响之分析, 加强了解西方当前学术研究的背景、现状和趋势, 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和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跨文化研究; 全球化; 新左派; 软实力; 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 C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18)01-0060-11

一、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 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 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对话和融通。跨文化交流, 就学术而言, 注重于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对中国而论, 则意味着探讨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将中华文化介绍到海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即为例证。而欲与他者对话, 势必需要了解对方, 尤其是熟悉西方学术界当前的研究重点和主要思潮, 把握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相似。唯如此, 方可讲好中国故事。

众所周知, 当代人文学科诞生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之中, 其学术思潮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叙述与本土思想文化运动,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紧密的互动。本文以美国本土文化和思想体系之起源和左翼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对欧美“东方主义”(Orientalism)学术体系之批判两大背景为切入点^①, 介绍当今西方, 尤其是美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主要论点及重要流派, 如“新保守主义”“新左派”“跨国民族主义”“灵活资本主义”“流动公

民”“记忆的政治”“亚洲价值”“可持续发展”及“软实力”等伴随着全球化进展而产生的新概念, 探讨当下中国学者应如何看待和评估这些全球化语境下涌现的人文与社科领域的新思潮, 以期更好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和知识体系, 加强跨文化交流, 讲好中国故事。

二、从美国本土文化运动与对“东方主义”之批判谈起

以美国为例。当代美国文化、艺术乃至人文学科的本土思潮和流派是在美国独立之后, 逐步脱离欧洲传统、开始探索美国知识体系相对于欧洲的独立性这一过程中诞生的。具体甚至可追溯至美国哲学家拉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于1837年8月31日在哈佛大学优秀毕业生典礼所作的题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这一著名讲演。

爱默生在演说中挑战了当时在美国知识、文化、思想界盛行的欧洲中心论。其主要论点为, 哈佛大学已建校200周年, 美国也已独立60年, 但美国学术与文化界似乎仍在追随欧洲的传统, 这一

作者简介: 尹晓煌, 男, 江苏扬州人, 哈佛大学博士,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美国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校长顾问和终身教授。从事跨文化交流、美国华人、中美关系等领域之研究。

思维方式应予改变，美国需探索并走出自己的道路。正如爱默生在演说中宣称：“我们倾听那些欧洲宫廷文学艺术女神宣教的时间已太久了。”^②有鉴于此，《美国学者》常被称之为“美国知识界的独立宣言”（America's Intellectu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它宣告了美国依附于欧洲文艺与思想界的现象行将就木。在随后的年代里，美国文学艺术领域逐渐产生出两个大相径庭的主要流派：“红皮肤”（Redskins）与“白面孔”（Palefaces）^③。前者以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之肤色为象征，注重美国本土、尤其是大众文化风格，代表人物有马克·吐温（Mark Twain/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1910）、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8—1961）等；后者则崇尚欧洲文艺界的高雅与细腻，其中有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哥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 1874—1946）等作家^④。美国学者以“红皮肤”和“白面孔”作为两大重要流派之简称，本身就显示出赞许美国本土文化风格的倾向性。英文“pale”一词本意为“苍白”乃至“病态”，暗喻美国人文和文艺领域之前途，唯有依靠美国本土学者的努力。一味追随欧洲，难有“健康”出路。

爱默生的演说极大地拓展了美国本土风格的人文学术研究，激励了美国本土文学之兴起，其论点对当今中国也有两个层面的借鉴意义。其一，对如何创建中国特色的人文与社会学科体系颇具启迪。其二，讲好美国故事的尝试与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之努力有着相通之处。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访问美国时，笔者曾出席基辛格博士为欢迎习主席在西雅图举办的晚宴。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他曾阅读过惠特曼的诗歌和海明威的小说，并提及为了体会海明威的创作风格，他曾在访问古巴时，参观了海明威当年侨居古巴写作《老人与海》（Old Man and Sea, 1952）经常光顾的渔港，体验海明威创作《老人与海》时的心境。习主席说：“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⑤

《老人与海》讲述的是主人翁历尽千辛万苦以达目标信念之精神，为美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刚强、毅力之象征。海明威的著名格言“人可以被击败，但不会被摧毁”，即为此意。值得一提的是，爱默生的论点不仅促进了美国学者争取本土艺术及人文学科独立于欧洲之探索，甚至也影响了当代学者对欧美中心论的质疑和挑战。在此领域，最具开拓性的学者之一当属萨义德及其经典之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

萨义德的身世极具跨文化象征意义。他出生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基督教家庭，其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美军，后移民美国。萨义德本科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后在爱默生当年发表《美国学者》演说之地哈佛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1978年出版了开拓性之名著《东方主义》。萨义德在书中指出，西方文化对“东方”长期的贬斥、丑化及所谓的“浪漫”解读，成为欧洲殖民主义奴役中东及亚洲的借口。

“东方”这一概念被扭曲成为西方的对立面，以衬托出“西方”之正确。欧美学者以西方代表进步、文明和人性，而东方则沦为非理性、野蛮及落后之象征。然而，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东方”。这一文艺与知识体系的“东方”，究其实质，只是西方学者为了在人文和社科领域创建其学术话语权，而臆想出的对亚洲文化之二元思维的固化概念，并逐渐形成影响，指导着西方对东方的普遍认知，这一认知至今仍影响着西方学术界^⑥。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曾试图以中国为敌，将中国视为对立面。当时我曾问及哈佛大学的孔飞力（Philip Kuhon, 1933—2016）教授美国为何要如此丑化中国，他回答道：“美国需要敌人”（America needs enemy）。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先地位，必须建树对立面，用敌人之“丑恶”显示美国自身之优越。这一概念与萨义德在文学批评中提及的“东方主义”相似。事实正相反，人类文明本是相同与平等的，正如晚清名臣陈宝琛（1848—1935）访问哈佛大学时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题写的对联所云：“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在文学、艺术和学术领域内，人为地划分所谓东方、西方，以及把东、西方视为两个敌对体的概

念，本身就是荒谬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影响极为深远，在于他澄清了西方对东方之解读源于政治偏见，具有帝国主义知识之特征。甚至那些对亚非文明抱有同情心的西方学者和作家如赛珍珠（Pearls S. Buck, 1892—1973），在其作品中对中国文明之描写，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见^⑦。

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详尽论述和颠覆性的批判，奠定了当代西方诸多左派理论之根基，为当代西方知识体系提供了转型基础，由此而产生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一些新领域。“后殖民研究”

（Post-Colonial Study）即为其中一例。后殖民研究指出，殖民地国家的今天，可被视为西方殖民统治之结果。西方殖民帝国的知识与价值体系，影响并改变了殖民地国家及其人民的思维、信仰、语言和文化传统。例如，我们传统称之为吕宋群岛的南海近邻，16世纪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后，被西班牙殖民者于1565年以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lip II, 1527—1598）之名重新命名为菲律宾（The Philippines）。西班牙殖民者将天主教带到了菲律宾，改变了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西班牙语长期成为菲律宾国语。正如萨义德令人信服地指出，殖民主义对东方的侵略，究其实质，为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武力征服，一方面用西方知识体系改变殖民地人民的文化价值和理念。

三、1990年代以来的主要论点及流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发生了巨变，极大地加快了全球化的进展。如果说近代全球化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葡萄牙开始向西非扩张，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人文和社科领域呈现两大重要变化：首先，在市场经济下，意识形态不再垄断知识体系。其次，高科技的兴起，使得学术思想和文化可以跨越地域和民族国家之疆界，迅速方便地得以交流。在这一背景下，西方人文与社科领域产生了一些新的学术流派，其中有“新保守主义”（其实质为现代形式的保守主义）“新左派”“跨国民族主义”“灵活资本主义”“流动公民”“记忆的政治”“亚洲价值”“软实力”等^⑧。

谈到“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neocon），似有必要提及两部领潮一时的西方新保守主义代表作：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⑨及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⑩。亨廷顿生前为哈佛大学教授，为美国保守势力在学术界的代言人，“文明冲突”理论之创始者。他认为随着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之争已被文明的冲突所替代，伊斯兰教和儒教文明威胁了以犹太—基督教为主体的欧美文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代替了过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他在去世前不久所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更加强了这一论点，声称美国今天的文化价值体系，尽管多元，核心依旧为英美新教主义价值观念，即所谓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⑪。亨廷顿的这一观念，部分是由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为崇拜上帝的单一神教，与儒教文明之包容性截然不同，有极强的排它性。亨廷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了当今世界何以产生各种暴力冲突，其观点影响了大批美国和西方学者，为新保守主义学派奠定了理论根基。

福山受教于哈佛大学，为亨廷顿的弟子，继承了亨廷顿的保守主义思维。他创建的概念在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界影响更为广泛。福山认为，冷战之终结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之终结，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史的终结。人类文明之发展已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告完结，西方社会主导的自由民主体系已经战胜了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阶段。福山视西方为冷战和意识形态之赢家而宣告历史终结，这一论断甫经发表，风行一时，成为新保守主义之学术基础。福山的历史终结之说当然过于绝对乃至荒谬。就本质而言，其历史终结论所阐述的新保守主义观点，是现代形式的保守主义，代表着一种回归宗教信仰，注重传统社会的家庭、婚姻理念及国家观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女权主义、民权运动、反文化运动、族裔身份政治等自由主义思潮之反动和对抗。

当代西方人文与社科领域中，与上述观点相抗衡的学术理念，以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左派”(New Left)为最。新左派与传统左派之区别在于，传统左派更重视工会和经典的产业工人运动以及政治、经济领域内的斗争。而新左派则认为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仅关注传统的产业工人已远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及文化的进步，应该支持和帮助更多服务行业和零售业员工等不为传统左派重视的非经典劳工阶层，保护边缘化和弱势群体，支持女权运动，捍卫移民权利，提倡多元文化和尊重非白人少数族裔。出生于英国的美国当代学者、“新左派”和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权威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1935—)即为其代表人物之一。

哈维认为，高科技的突飞猛进虽极大地改变了当今世界社会和经济面貌，但全球化价值实现过程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剥削。消费者和金融、商业资本之间的斗争已成当今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生活中，因科技进步而在生产阶段取得高工资、相对富裕的工人阶级会发现，在全球化的今天，商业、货币和食利资本层层盘剥了劳动人民的消费需求。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劳动成果，被资本的其他部分在消费过程中巧取豪夺。因而与过去相同，工人阶级仍被资本奴役。哈维的这一论断加深了我们对《资本论》的理解。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无产阶级的反抗方式也必须因此而改变。作为新左派的代言人，哈维指出：“不幸的是，传统左派对组织快餐业的员工并不热心。”因为这些非产业工人的价值生产，与传统左派关于经典工人阶级的认知并不相符。然而，哈维强调，在全球化的进展过程中，无产阶级并未消失，而是出现了新的无产阶级，虽然他们与传统左派视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产业工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就此而论，麦当劳员工可被视之为21世纪的钢铁工人^②。

此外，哈维对全球化视野下真理的普世价值与地方性作过精辟论述。他指出：“普世性的道德判断若无地方根基，便有可能沦为空洞与虚假。”^③这一颇具创见之论断，令人忆及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名言：“人权也许具有普世价值，但在不同文化中，可以由不同体制来体现。”(Human rights may

be a universal aspiration, but in different cultures, they may be institutionalized in different forms.)^④换言之，倘若普世价值并无地方根基，未与民族与本土文化挂钩，则会流失于空洞和虚伪。因为普世价值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体现方式。也许西方更强调“爱幼”，但对中华传统文化而论，“尊老”难道不也是人权的体现吗？

哈维对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精辟的阐述表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全球化时代不仅并未过时，反而更能开拓我们的视野，为全球政治与社会改革指明方向。例如，在当今社会焦点的女权问题上，马克思早就前瞻性地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⑤就此角度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影响之深度解读。

与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相关的另一新思潮为“跨国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它是全球化时代对传统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和国际化理论的挑战与发展。如果说“国际主义”注重于国家及与此相关的国际关系研究，偏重各国政府及官方组织和人士之间的交往。作为国际主义的对立体，跨国民族主义则强调非政府组织与民间人员的跨国行为，探讨随着世界进入后冷战和经济一体化，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化逐渐为全球化所替代，非政府组织、包括跨国资本和各类民间团体与普通民众，日益活跃于学术、文化、商业、金融、移民、慈善等范围内的跨国交往，及其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重大现实影响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此类交往中，国家与政府已变得“无关紧要”，不再担负关键甚至任何重要作用。虽然跨国民族主义作为全球化范畴内的社会思潮、文化现象及交往模式早已存在，但正是在世界进入后冷战及高科技信息时代的今天，这一观念及其相关行为才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并得以迅猛进展^⑥。出生于荷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斯卡娅·萨珊(Saskia Sassen)将此现象称之为另一形式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即有别于“领土疆界”(第一)和“政府权威”(第二)、随全球文化与经济一体化而兴起的“跨国民

间交往权力和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种跨越疆土、超越国家体系的新型民族主义情结^⑦。这是一种由各类跨国民间力量及资本推动的“平面/环路模式”全球化，而非由政府、官方国际组织掌控、自上而下的“垂直/纵向体系”全球化。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对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形成持续的巨大影响，并为全球化研究奠定了新课题，同时也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左翼学者所提倡的“从基层着手”（from the bottom up）之科研方向相对应^⑧。两者均着眼于为学术界精英主义（elitism）研究所忽略，但却对社会动态有着举足轻重影响之凡人与常事，以便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进程及社会发展方向。

全球化进展中，民间出现的交往模式与新型流动，也可被称为“灵活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这一学术概念的理论构建，是由出生于马来西亚的美国华人学者王爱华（Aihwa Ong）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系统探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公民身份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之后，创见性地提出。王爱华首先将“灵活公民身份”界定为各种跨国民族文化要素之核心，起源于主体（个人）因“跨国资本的积累、流通和移位，对于变化中的政治、经济条件做出灵活反应和适时变化之文化逻辑”^⑨。通过对海外华人社会各阶层移民家庭以及跨国政治和泛宗教与民族主义话语进行的人类学研究，王爱华构建了跨越疆界和民族国家的文化逻辑形成之背景，并由此解读了“跨国民族性”“分级主权”等全球化理论范畴内的话语概念，提出个人、国家和地域权力争斗与隶属关系中的文化逻辑。

尤为重要的是，王爱华细致考察了文化如何参与晚期（当今）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时代的主体行动和意义，以及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等要素又是怎样改造和重塑文化自身，由此令人信服地将人类文化实践和逻辑与跨国资本、信息和人口流动，同置于全球化研究的主流核心之中。她认为，受后冷战时代全球一体化影响，晚期资本主义与此前不同，不再受思想意识形态束缚，投资目的更倾向于逐利而为，因而得以超越疆土、社会体系或政治阵营之间的界限。王爱华将此

称为“灵活资本主义”（flexible capitalism），视其为当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之一^⑩。

世界进入后冷战与全球化以来，为塑造集体记忆，国家及民族另辟蹊径，日趋依据和运用“选择性记忆”这一特定文化模式，借助与本民族和国家相关的各类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遗产，而非仅凭意识形态和经济、法制管理体系来重塑文化和思想核心，超越各方歧见，团结人民、巩固社会，加强国家与民族之凝聚力。这一方式被命名为“记忆的政治”（politics of memory）。这一术语解释了政治在塑造集体记忆中的作用，以及记忆如何与事件发生的客观事实可能有着显著的不同^⑪。

政治对记忆的影响，尤其是如何通过选择性记忆增强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常见于文艺创作与历史写作和传承方式。就美国而言，以“9/11”为题材之大量各类文学、艺术创作和媒体舆论等，均或明或隐地宣扬乃至强化人民大众对“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ism）这一代表美国独特文化传统之“集体记忆”。世界其他国家与此相关的具体个案与事例，也比比皆是。

在我国，如何凝聚复兴中国梦这一宏伟蓝图，加深中华民族传承历史的记忆，也是当今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课题。而记忆与语言又休戚相关，盖因语言是文化与记忆最重要的媒介。出生于中国昆明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983）一书中指出，语言是文化与记忆的基本手段。他强调：“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particular solidarities）……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⑫著名当代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就曾在其经典著作《中国男人》（China Man）中回忆道，中文媒体如何成为维系她的祖籍广东、侨居美国40余年的父亲与故国之纽带：“每天，唯有阅读中文报纸这件事才能让父亲离开他的安乐椅。他总是急切地盼望着报纸的到来。每次都

提前几小时打开家门, 等候邮差……。《金山时报》是装在封套中从旧金山寄来的, 上面端正地印着父亲的地址和姓名。他戴上金丝眼镜, 往烟斗里装上烟丝……拉开了他每天长达数小时的看报时光。”^③

与上述学术思潮相比, “亚洲价值”(Asian Values)为亚洲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产物。这一概念始创并流行于东亚和东南亚有其特定缘由。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亚洲价值受到欢迎的部分原因是它将儒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糅合为一体, 从而有助于在这些国家的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创建一种共同价值观, 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日本得以流行, 因为它不仅挑战了西方, 同时也为日本重建其在亚洲的地位提供了理念。在全球化的今天,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是唯一在经济发展方面持续增长的西方世界之外的地区。亚洲价值观的支持者将这一成就归功于一种介于西方自由民主体系和极权政治之间的独特的“第三道路”(Third Way)^④。

就内涵而言, “亚洲价值”深受儒家文明的影响, 注重对家庭、社区和国家的忠诚, 主张为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放弃个人自由, 追求教育和科技的卓越, 赞誉勤勉的职业道德和节俭的生活方式。

“亚洲价值”的支持者认为, 这一理念强调了国家主权、自决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高于普世价值, 比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更适合于亚洲地区。

“亚洲价值”也许有其不足之处, 但应当承认, 在当今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 西方标准并非唯一的发展模式。究其实质, 亚洲价值主要是力求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加以控制, 以达社会稳定, 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创造财富, 再用财富改善社会, 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而非单纯推行西方社会视为普世价值的“政治民主”^⑤。就此而论, “亚洲价值”的包容性要高于西方价值, 且不乏成功的实证。例如, 李光耀治理新加坡50年, 将“亚洲价值”引为治国方针。其治下的新加坡, 如柏拉图的“理想国”: 由“哲君”治理, 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人民安居乐业。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 在当今全球化大潮中, 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既未沿袭西方道路, 也没

有实行苏联解体后的“休克”模式, 而是走出了自己的路径, 从而挑战了西方模式。西方学者曾质疑, 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是否确能另辟蹊径? 社会和经济发展与转型是否确有“中国道路”? 进言之, 中国能否避开曾阻碍若干发展中国家进步的“中等收入陷阱”, 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一方面, “中国道路”确有争议。因其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廉价劳力和能耗之增长方式, 类似于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 中国似在重复那些全球新兴经济实体曾经历的阶段。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发展有其难以否认的独特性。在全球范围内, 没有任何可供中国直接借鉴之经验。由于人口众多, 始于20世纪50年代、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及沿海富裕地区和贫困内陆间的巨大差异, 其经济转型必须源于“中国制造”。这无论是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科技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还是转型为以生活富裕和良性生态为主体之可持续性增长, 抑或于更进一步融入当今日趋复杂的全球一体化经济, 均为如此。中国的经济转型既非效仿新自由主义之“华盛顿共识”, 也有别于前苏联的“休克疗法”, 而是扎根于中国社会进步所面临的实际需求中, 不断地磨合前进。

就此而论, 中国作为经济巨人兴起于全球市场及其令人惊叹之卓越成就, 的确是另辟蹊径, 代表了一条鲜明独特、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与别样的增长方式。换言之, 始于40年前的中国经济转型, 不仅涵盖他国现代化进程所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 其发展模式既有别于国有型社会主义, 也非经典资本主义, 具备了中国特色, 立基于中国国情。这一模式证明了“中国道路”的可行性, 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在经济发展与转型中, 确实存在着不同类型的选择及超越国家和市场二元对立型的增长模式。这就是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因为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模式, 任何发展都必须致力于中国发展、中国制造。无论是转型, 或者是生态经济、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 都必须摸索中国自己的道路。这不仅适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也适用于文化、艺术及人文与社科知识体系之建设^⑥。

四、全球化语境中的“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概念为约瑟夫·奈（Joseph Nye, 1937—）首创于20世纪90年代初，如今已倍受世界各国政府重视。奈曾任美国卡特总统的助理国务卿及克林顿总统的助理国防部长，并曾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他根据自己长期在美国政界任职及学术研究之经历，尤其是美国越南战争的失败及苏联解体之经验教训，认为一个国家存在“硬”与“软”两种实力。硬实力指国家的军事、经济等实力，而软实力则为文化影响和精神凝聚力。具体而言，对内，软实力体现在对国内社会的导向力、民心认同与亲和力；对外，则表现在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和号召感。软实力之构成，分几个不同层次：其核心为价值体系，如意识形态、辨别判断力、宗教信仰；中层为维护核心价值之管理、法制观念；表面则为传播核心价值影响之通俗文化、流行艺术、生活习俗等^⑦。

近年来，奈在论证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他认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仅具有“软”和“硬”两种实力尚不足以取胜，唯有将这两种实力巧妙地加以综合运用，才能事半功倍，得出出奇制胜。他将这一综合运用称之为“巧实力”，即：当硬就硬，该软即软；既能运用文化传播影响力取胜，也能依靠经济与军事实力强打硬拼克敌^⑧。

奈并非软实力首创者，此前就已有学者提出类似概念。笔者在哈佛大学就读时的导师之一、著名日裔学者入江昭教授（Akira Iriye, 1934—），就曾在其名著《权力与文化》（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 American War, 1941—45, 1981）一书中，通过剖析二战时期日美关系，提出“文化力量”这一概念。他指出，日本二战期间败于美国，并非完全由于经济与军事实力不足，更是缺乏与美国抗衡的文化影响力。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成为唯一于西方之外的世界强国，终因无相应的文化力量为后盾，最终负于美国^⑨。简言之，硬实力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质力量；而软实力则是文化影响、精神感染力，为硬实力的无形

延伸。若无文化软实力为手段与载体，经济与军事硬实力就无法持续发展。更有美国学者声称，前苏联并非毁于美国的传统硬实力（导弹武器和经济封锁），而是被以好莱坞、可口可乐为代表的美国软实力——价值体系、文化影响力所打垮。

由于软实力能通过文化影响而非武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妙用，因而与硬实力并驾齐驱，成为西方世界16世纪以来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传教士运动及其相应的文化、教育影响，就是典型的西方软实力对外渗透和扩张，加速和巩固了西方在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在当前全球化大潮下，经济一体化、高科技信息革命与互联网之形成，使得文化软实力及其影响，更具超强的渗透力与扩张性。卫星电视、手机、电脑视频的普及，导致音乐、电影、文学、艺术等文化软实力之要素，瞬息间跨越国界与时空，遍及千家万户、男女老幼，对各国人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形成铺天盖地的影响。就中国而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尤其是通俗文化，如餐饮等，得到飞快提升。据美国《时代》周刊统计，中国食品在美国已成为仅次于意大利之外的最为流行之食品。

然而，中国软实力及其国际影响，仍远远落后于其经济实力。中国当今已成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国民生产总值第二大国。然其国际文化产业不但无法与美国相比，甚至落后于日本、韩国等东亚邻国。中国的少林、太极等传统武术尽管历史悠久，但在西方社会中最有影响及流行的东方武术，仍为日本柔道与韩国跆拳道。更有甚者，美国民众对中国电影几乎无人知晓。笔者曾在任教的密歇根州立大学一个班级里询问，有谁看过中国电影，全班25位学生竟无一人举手。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笔者的白人秘书说她看过的唯一中国电影，是好莱坞出品的《功夫熊猫》。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与其经济实力大不相同。美国的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之43%，欧盟占34%，而中国仅占3%。美国电影的海外票房收入为183亿美元，而中国为3.78亿美元，仅为美国零头^⑩。文学方面，甚至笔者熟悉的一些文学领域的美国教授中，也鲜有人阅读过当代中国文

学作品。中国新闻媒体与出版领域也与美国有着巨大差异。如果说,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经济实力已接近美国, 步入“第一世界”; 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国际影响, 仍处“第三世界”水平。由于软实力既有文化产业之商品和资源功能, 更属意识形态和学术及思想体系范畴。因而事关民族兴亡, 社会安危。中国如欲和平崛起, 真正成为世界强国, 就必须加速发展软实力, 加强中国文化之国际影响。

笔者最后将梳理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帝国”概念及其相关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美国杜克大学哈特教授(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著名左派律师、前《红色旅》法律代表纳格里(Antonio Negri)在合著的《帝国》(Empire, 2000)一书中, 把以全球化为核心、历史上独特的全球统治形式理论化并加以解读。此书出版后, 引起西方学术界极大反响, 被誉为“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f the 21st century)。哈特和纳格里指出, 美国实质是全球化的新“帝国”。但它与传统的殖民帝国不同: “‘帝国’, 我们理解为与‘帝国主义’彻底不同。帝国主义确实是欧洲民族国家超越其边界的主权扩张。……与帝国主义相反, ‘帝国’不建立权力的领土中心, 也不依赖于固定的国界和保障。它是一种去中心和去领土化的原则性体系, 这一体系不断把整个世界包含在自己开放的、延展的疆界之内。”^③

哈特和纳格里认为, 当今全球化的进程处于帝国构建的中心。这个进程是持续不断, 而非不确定的。然而, 这些进程同样导致了抵抗的产生。这种抵抗为相对于帝国整体逻辑的不同全球化之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 “通向帝国之路及其全球化过程为产生新的自由力量提供了可能。当然, 全球化不是单一的事物, 我们认之为全球化的多种进程也不是统一和单义的。我们认为, 我们的政治目标, 不是简单地抵抗这些进程, 而是承认它们并重新把它们引向新的目标。维持帝国的多种创造力也能够自动构建一个反帝国, 以及建造另一个全球流通和交锋的政治体系。企图质疑和颠覆帝国的斗争, 一如那些企图重建一个帝国的斗争, 将会在帝国的土地上发生。这些新的斗争已经开始出现。”^④换言之,

全球化的发展, 最终将促进“帝国”的灭亡。这正如马克思当年预言, 机器和工厂的出现, 导致了无产阶级的产生, 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哈特在其近作《全球化思维中的“共有资源”》中, 进一步将全球资源界定为既包括土地、矿藏、淡水和空气等有形物质资产, 也涵盖语言、知识、观念、习俗情感等人类特有之“文化无形资源”。他指出, 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 文化遗产在跨国资本的运作下, 经由各类文化节日、“申遗”等活动, 转而从人类无形共有资源“升级”为资本或某些群体掌控下的有形财富。其结果是, 这些人类原来的无形共有资源, 虽能在短暂或特定时期内身价倍增, 衍生利润; 但长远而言, 如同资本早期对矿藏和土地等有形自然资源掠夺一样, 难以从原本人类自然共享状态下得到滋润与再生, 从而导致损毁^⑤。

换言之, 跨国资本对无形共有资源的掌控, 类似于版权将人的精神思维变为法律保护下的私有产权, 在营利之时限制了人类知识的更新与传播, 从而阻碍了文明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就此而论, 跨国资本及其全球化代言者对人类无形文化共有资源之规范, 实质是借法律保护为幌, 行强取豪夺之实, 远恶劣于个人偷盗行为。因而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就在于怎样才能使人类免费同享文化共有资源。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 哈特断言, 跨国资本对地方与民族文化垄断剧增之时, 即为全球共产主义革命升温加热之际。这一对全球化前景的乐观瞻望, 令人忆及《共产党宣言》之结论: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⑥

五、结论

全球化的进程和高科技的发展使得人文与社科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跨语言、疆界、文化的研究因此而获得新的空间。数码技术颠覆性的进步推动学术研究步入新一轮的空间革命。英国全球化文化研究著名学者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认为, 全球化确实已成制造和传播文化身份最重要的力量, 而非像某些传统学者所设想的那样化解了文化认同

感。他并由此讥讽了那种悲天悯人式的文化怀旧之情。例如，在以奥瞿（M. Auge）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学者眼中，“节奏缓慢的法国外省小城镇”是有着足够的、相互作用的场所之典型：“那些地方在教堂的台阶上、市政厅前、咖啡馆柜台、甚至在面包店的走廊里随意的几句交谈，马上可以令人遗忘孤独。”^⑤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得这样的文化场景所剩无几，因而令人伤感。

与奥瞿等欧洲传统学者的结论相反，汤姆林森指出，全球化变革之本质其实更加微妙，“超市、购物中心、机场、加油站、影城、银行大厅等这些安装了自动取款机的‘无特定性地点’”，乍看之下显示着一种“抽象、无人情味甚至异化，但这些地点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引发、或者膺服于自身文化的相互作用。超市收款台不仅是交易地点，而且也是闲聊、幽默、观察、玩笑和争论的场所。如果旅行路线相交叉，熟人们也会约定在候机厅共度难捱的等待时光”^⑥。简言之，全球化就其实质与进程而言，是一件远比人们所设想的更加复杂且不断进步之事。因此，全球化文化研究不应低估民族和本土文化蕴含的自适性和抵抗性资源。鉴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学和艺术作为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理应责无旁贷地对当代全球化进程做出反应。身处全球化进展前列的人文与社科领域的中国学者，更应在习近平主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伟大号召鼓舞下，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①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美国著名左派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其主要著述有《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

②引自马库斯·坎利夫（Marcus Cunliffe），《美国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方杰译，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年，35页。

③“Paleface”也可译为带贬意之“白种人”。

④J. A. Cuddon,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er, 2013.

⑤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西雅图，2015年9月22日），新华网，2015年9月23日。

⑥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8.

⑦笔者无意在此褒贬赛珍珠在其作品中对中国和华人形象的描述。她曾创作了几十部关于中国和华人的著作，曾在1935年获普立策奖，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对中国文化和华人形象之重塑做出了贡献。许多美国人认为她的《大地》（The Good Earth, 1931）连同1937年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是促使他们改变对华人看法的最积极、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整整一代美国人来讲，赛珍珠创造了‘中国人’，就像狄更斯‘创造’了许多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贫民窟中的人物一样。”引自艾萨克（Harold R. Isaacs），《我们心中的划痕》（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Views on China and India, 1950），155页。

⑧西方人文和社会学科领域近年来涌现的其它若干重要流派，如：新自由主义、解构主义、属性政治、文化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因本文篇幅有限，不做赘叙，有兴趣者可参见尹晓煌和何成洲主编，《全球化与跨国民族主义经典文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及其它相关著作。

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曾谈及，《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之再创》一书题目为编辑所定，他并非完全赞同。参见J. S. R.，“Samuel Huntington: Prophet,” Harvard Magazine（January-February），2018年，20页。值得一提的是，亨廷顿为人随和、诚恳。笔者就读于哈佛时，曾多次求教于亨廷顿，对其学者气度和大家风范，留下深刻印象。

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美国日裔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博士，主要著作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1992）、《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2011）、《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2014）等。应当指出，福山近年来修正了他的新保守主义观念，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远未获胜，历史更未终结。见其近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⑪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 ⑫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价值实现危机与日常生活政治学”, 专题演讲, 南京大学, 2016年6月7日。本段文字引自《澎湃新闻》对哈维演讲的报道, 2016年6月8日。笔者根据与哈维之访谈记录作了些许校订。同时可参见周宪、何成洲、尹晓煌, “与哈维的访谈: 空间转向、空间修复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 《学术研究》, 2016年8月; 杨婷, 吴楠, “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对话国际知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8月4日。
- ⑬David Harvey, “Places, Regions, Territories,” in David Harvey,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6—201页。
- ⑭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哈佛大学讲座教授, 美国学术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泰斗,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此文引自John S. Rosenberg, “Peering into the Future,” *Harvard Magazine*, 114:1 (Sept.-Oct.), 2013年, 25页。
- ⑮《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书信》第四卷, 1995年, 586页。
- ⑯尹晓煌和何成洲主编, 《全球化与跨民族主义经典文论》,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⑰Saskia Sassen, “The Places and Spaces of the Global,”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Globalization Theory: Approaches and Controversies*, London: Polity Press, 2000: 79—105页。
- ⑱孔秉德和尹晓煌主编, 《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年, 1—3页。
- ⑲Aihwa Ong (王爱华),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6页。
- ⑳同上。
- ㉑A. Huyssen, *Present Pasts: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㉒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吴叻人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年, 125页, 43页。
- ㉓Maxine Hong Kingston (汤亭亭), *China Me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1, 251页。
- ㉔W. De Barry, *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㉕Tu Weiming (杜维明), ed., *The Learn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4页。
- ㉖Hong Yinxing (洪银兴著), *The China Path to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Xiaohuang Yin (尹晓煌译), Berlin/New York/Singapore: Springer, 2016.
- ㉗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 ㉘Joseph Nye, “Smart Power,” Lecture, Occidental College, Los Angeles, March 17, 2016.
- ㉙Akira Iriye (入江昭),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 American War, 1941—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㉚张梅, “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 会议论文, “2018全球人才流动、移民与移民法”国际学术会议, 北京: 2018年6月9日。
- ㉛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引文出自此书中译本《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杨建国、范一亭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
- ㉜同上。
- ㉝Michael Hardt, “The Common in Communism”, in *Rethinking Marxism*, 22:3 (2010), 346—56页。
- ㉞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年。394—435页。
- ㉟John Tomlins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Analysis”,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Globalization Theory*, London: Polity Press, 2007年, 146—168页。
- ㊱同上。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Global Discourse

Yin Xiaohu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new and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global discourse. It analyzes various major concepts and theories that have made an impact on contemporary Western scholarship, especially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including “neoconservatism (neocon),” the “New Left,” “transnationalism,” “flexible capitalism,” “flexible citizenship,” “politics of memory,” “Asian Valu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oft power.” By analyzing the sources and influences of these popular ideas and important thoughts,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curr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in Western academia, thus more successfully promoting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nd discourse about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Transcultural Studies; Globalization; New Left; Soft Power; China Path